

跨文明对话书系
KUAWENMING DUIHUA SHUXI

《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

刘占祥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跨文明对话书系
KUAWENMING DUIHUA SHUXI

《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

刘占祥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 / 刘占祥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10. 7
ISBN 978-7-80752-636-0

I. ①老... II. ①刘... III. ①老子—研究 ②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B223.15 ②I 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7830 号

《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

刘占祥 著

特约编辑	卢 芸 颜菊思
责任编辑	施 维
封面设计	杨 艳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028)85011398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3.375
字 数	25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636-0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跨文明对话书系》编审委员会

学术顾问：朱立元 曹顺庆

主 编：徐行言

副 主 编：汪启明 傅勇林 段志洪

编审委员会委员（按音序排名）：

柏桦	段志洪	傅勇林	高力	李岗
阮航	施维	苏志宏	汪启明	徐伯初
徐行言	谢艺波	易伯伦	赵静	

总 序

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自古而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由来已久。然而自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不少东西方学人都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乃至生活方式视为衡量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尺，把社会进步的理想目标定位于以西方发展模式为蓝本的现代化，或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普世文明。西风东渐、西学东移，相当一批东方学人和政治家也把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科技进步看做西方文明的必然产物，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寻求真理，甚至将扬弃本民族的传统，从器物、制度到生活方式上全面模仿西方作为实现现代性改造的唯一模式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归宿。东西方文明的交流遂呈现为单向的态势——以先进的西方文明征服、影响和改造其他所谓“落后”或“野蛮”的文化似乎成为人类走向现代化生活的必然趋向。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由于交通、信息交流的日趋便捷，发达国家产业的转移和国际市场的开拓，不同地域和文明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和文化联系不断增强，人员、商品、信息乃至生活方

式、思想观念的流动和相互沟通日益增长，逐渐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各种复杂关系渗透交织的网络，全球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的大势所趋。然而，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将出现一种全球同质的“世界文化”或“地球文化”，相反，随着西方式工业文明内在矛盾的凸显、西方知识界的自省和一大批民族国家的重新崛起，本土化、地方化也成为全球化语境下许多后发区域维护民族文化传承、保持自身文化特质的策略。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已不再是简单地演绎强势的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及其他弱势文明的征服或同化的模式，相反长期处在边缘的第三世界地区的文化传统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对现代性的诠释，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寻求走向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与道路。

尽管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乃至对抗仍难以避免，不同文化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与冲突依然存在，但和平发展、和谐相处毕竟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因此，对话正在成为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基本立场和方式。

何谓对话？对话的实质应是不同主体间双向互动的交流。哈贝马斯把对话作为不同社会阶层交往的主要形式，认为通过对话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正是交往行为的目的。而巴赫金则将对话关系看做无所不在的现象，他认为整个人类的语言、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乃至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之间都浸透着对话关系。毋庸置疑，对话的精神是交流、沟通与互动。这里有相互的凝视、好奇与欣赏，有积极的理解、借鉴与汲取，有主动的自省、调整与改造。总之，它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学与互渗过程，文化学所总结的关于文化交往过程中的互化与涵化现象都可以说是对话的成果。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文明间对话的基础应是平等、相互尊重，而不是仰望或歧视，更不是恃强凌弱的输出与同化。

那么，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应当怎样进行呢？显然，我们所理解的文明间的对话并非政治家之间的会谈，也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文化交往，甚至不一定都来自实际的接触行为或交互关系研究所产生的主题，而是包括能使文明之间产生碰撞与交流的所有可能形式——它有时借助于面对面的接触，相互汲取对方的优势，滋养自身的肌体；有时却并无直接交往，只是文明画廊中不同文化间差异的自然呈现，各自在对异域风景的注视中产生心有灵犀的感悟、启迪，乃至误读。此时，其中一方只需利用某种可以达成沟通的媒介和语言，将自身的文化特征与个性表达出来便已成为对话的主体。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将这一套丛书定名为“跨文明对话书系”。这里汇集了西南交通大学“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艺术与传播学院”、“外国语学院”一批教授和博士多年研究的成果，其中包括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经典成果的多视角研究，关于中外语言文学的交流与影响的个案分析以及基于现代学术立场、运用现代方法进行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个案研究，可谓众彩纷呈。此中既有对过去的中西对话所产生成果的研究总结，也有在当下的语境中对其他文明的审视与读解，还有对中华文明自身文化传承的整理与反思，其中自应包含着对新的对话的期许。相信这些学术探索对于读者加深对全球化时代中西文明的交互作用以及东西方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会有所裨益。

感谢西南交通大学出版基金的支持。让我们将这一系列学术成果作为西南交通大学年轻的人文学科对正在走向多学科协调发

展的母校的献礼，并借以恢复“交通”这一术语最古老也最丰富的意蕴。

徐行育记于斑竹苑

2008年6月

序 言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学术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下半期以来持续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1995 年，我提出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在学界引起热烈反响。此后很长时间内，围绕这一问题，学者们争论颇多，新见叠出。无论是否定还是认可我的观点，关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用自己的话说自己的事”却成为某种共识，反映着伴随中国的迅猛发展有识之士对于“发出民族声音”的热切呼唤。重建中国文学理论的途径主要是：一方面，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即深入发掘古代文论的话语系统与言说方式，结合中外古今文学现象进行阐释，并在阐释过程中，验证古代文论的普世性与民族性，验证古代文论的历史局限性和在当代的有效价值；另一方面，推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西方文论有着明显区别于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到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西方文论表现出迥异于中国文论的路数，但这并不能说西方文论就一定与中国文论冰炭难容，恰恰相反，如果能主动学习和借鉴西方文论，结合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实际，进行中西文论的对话，对于西方文论的

“中国化”，对于主动借鉴西方文论话语以建设中国文论话语，具有重要的意义。要之，我们既要反对“中国中心论”，也要反对“西方中心论”，任何无视中西方文论异质性和话语独立性，简单地“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的做法都不是辩证的、科学的态度。

话语，是个复杂的范畴，它是文论的主要知识载体和价值载体，影响和决定着文论的基本样态，规定着文论的特质。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不仅在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被广泛应用，而且，在现代中国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少前辈时贤也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文论话语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探索，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领域，值得下一番功夫去进行探索。

《〈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一书正是沿着这样的理路展开的，作者试图从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和言说方式两个层面，对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研究，并在这种研究中清理明显具有老子及其道家特征的文论话语，以期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尽一份力量。在先秦思想家中，老子思想学说非常独特，他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解读方式、意义生成方式，都与孔子以及先秦其他思想家表现出很大的不同。本书作者从老子的思想体系出发，在对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和言说方式的解读中，在主动进行中西方文论对话中，清理了老子的一系列话语，彰显了老子及道家话语的鲜明特征，这种研究和探索，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对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论话语的构建，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占祥是我的博士生，是一位肯于吃苦、虚心好学的学生，有

着山东人的质朴、勤勉和执著。在川大读博期间，他以持续不懈的努力坚守于学问的探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和加工而成的，论著即将付梓，作为他的博士指导老师，我对于弟子的进步感到十分欣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希望占祥能奋勇前行，继续孜孜以求“诗学话语”及比较诗学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是为序。

曹顺庆

2009年11月于川大花园

内容摘要

话语，是诗学的主要知识载体和价值载体，影响和决定着诗学的基本样态，规定着诗学的特质。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不仅在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被广泛应用，而且，在现代中国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也有不少前辈时贤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诗学话语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探索，试图在清理中国古代诗学话语的基础上，重建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诗学话语，以彻底摆脱中国诗学研究领域多年来用西方式话语“说自己的事”的尴尬境况。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领域，笔者力图追随骥尾，选取《老子》这一道家奠基之作，通过对《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关系进行系统探讨，进一步清理富有道家特色的诗学话语，为重建中国诗学话语略尽绵薄之力。

一部《老子》，区区五千言，但却对后世中国文化以及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话语的角度看，《老子》在话语解读方式、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言说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与先秦诸子的很大的不同。《老子》的最高范畴是“道”，从这一源点出发，《老子》形成了“无——道——有”的思想体系，对文化典籍、人类

自我、人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等进行消解性解读，并在这种消解性解读中，形成了“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诗性的言说方式，从而构成了道家思想系统，最终形成了道家独特的话语系统。《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对中国诗学话语最显著的影响在于：为了体认和把握那终极的大“道”，一方面，《老子》提出了语言和意义的关系问题，庄子紧随其后进行大量阐述，言意关系问题遂为后世诗学家所关注，启示着人们设法借助语言而又超越语言，中国诗学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致”，乃至“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等，无不可以追溯至《老子》以及庄子；另一方面，《老子》在“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中，提出了诸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虚实相生”等等命题，这些不仅本身就是典型的道家诗学话语，而且对于中国诗学话语无不产生着极强的塑造性作用。不仅如此，由于在老子那里，“道”是“无”，“道”是不可言的，“道”是只能体悟的，为了使得人们认识和把握那永恒的大“道”，老子运用直觉思维而非理性思维，运用诗性言说而非理性言说的方式，在这种直觉思维和诗性言说中，老子使用了大量诗性话语，对于中国诗学话语的诗性特征的形成，发挥了很大的导向性作用。同时，对于“道法自然”的强调，不仅增加了老子诗性言说的分量，而且引导着一种诗意的生存方式，成为中国诗学形成诗性特征的重要精神根基，进一步铸成了中国诗学及其话语的诗性内质。

笔者认为，《老子》是通过其解读模式、意义生成方式和言说方式等，对中国诗学话语产生巨大影响的，因而，为了深入认识这些问题，本书从老子“无——道——有”的思想体系出发，系统研究其消解性解读模式和“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以

及诗性言说方式，揭示它们对中国诗学话语的影响；并且，主动进行相关的中西比较和对话，力图在这种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比较与对话中，彰显《老子》对中国诗学的无可替代的影响，凸现中国诗学话语中的道家话语系统特征。

按照这样一种构想，除绪论和结语及余论外，本书设计了六个章节。

绪论部分，首先对于目前学术界仍有不同认识的“诗学”、“中国诗学”、“话语”等概念进行了厘定，确立了研究对象：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之间的关系。继而，重点对 20 世纪以来道家与中国诗学、尤其是近些年来学者们从话语分析角度进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对回归元典、扣紧元典以小心求证的方法以及中西比较和对话的方法进行了说明。

正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探讨了《老子》的“无——道——有”的思想体系，研究了“道”这一《老子》最高范畴的由来和演变；比较了孔子之道和《老子》之道在源点上的不同——前者更为侧重于人伦性，是“人（伦）之道”，后者更为侧重于自然性，是“天之道”。分析了《老子》“无——道——有”的思想体系的具体内容，并将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与《老子》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比较。

第二章探讨了由《老子》的思想体系产生的《老子》的消解性解读模式和“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老子如何通过消解文本、人类自我、人类社会、宇宙万物等等，在消解性解读中生成意义，建构永恒的大“道”的。同时，将孔子“依经立义”的

意义生成方式与《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进行必要的比较，从而使《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的独特性进一步显现出来。

第三章探讨了《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与中国诗学话语之间的关系。《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对中国诗学话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语言和意义关系的阐述，以及“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虚实相生”等命题的提出上。为了认识和把握“道”，《老子》采用“正言若反”的方式，以“不言”言之，藉“有”而言“无”，藉“有言”而“无言”，由《老子》开其端，庄子承其后，提出了言意关系问题，影响着后世诗学家积极探索如何借助语言而又超越语言，进而影响着中国诗学话语的追求。同时，《老子》提出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虚实相生”等等思想命题，显然原是为了通过分析“无”、“道”、“有”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体认和把握“道”，但后来进入到中国诗学，也对中国诗学话语的塑造产生了极大作用。为进一步弄清楚这些问题，论文从中西比较融通的视野，进行了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对话。

第四章探讨《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和西方意义生成方式的不同。《老子》的“道”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分别是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源点，各自生成着不同的意义。两者之间尽管有着许多相似特征，但从根本上说，《老子》之道倾向于“无”，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则倾向于“有”，从这一不同源点出发，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不同的路径，并形成了不同的诗学话语体系。从“逻各斯”出发，西方形成了强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形成了一种“逻各斯”话语权力，消解“逻各斯”成为海德格尔、德里达等西方学者的孜孜追求。

第五章探讨了《老子》的诗性言说方式与中国诗学话语之间

的关系。分析了诗性（智慧）的内涵及其特征以及中国早期的诗性（智慧）的表现。之后，探讨了《老子》的诗性言说对中国诗学话语的影响。《老子》之所以要进行诗性言说，从根本上讲，乃是因为“道”是“无”，是不可言说的，诗性表达比理性表达更适合于认识和把握“道”。质言之，这种诗性言说，一是取决于《老子》的直觉思维，或者说，《老子》的直觉思维决定着其诗性言说，并呈现出其一系列带有诗性特征的话语，如“玄”、“妙”、“渊”、“湛”、“微”、“希”、“夷”、“恍惚”、“神”等等。二是由于“道不可言”，《老子》因而运用了诗性的隐喻、选取具象性的事物进行诗性言说，如“橐籥”、“谷”、“车”、“器”、“室”、“婴儿”等，有时又用“烹小鲜”、“畏四邻”、“冰将释”等形象性的事理设喻进行诗性言说。三是由于“道法自然”，《老子》一方面广取自然之物如“水”、“刍狗”、“张弓”等等，进行诗性喻说，另一方面，对于自然、自由的强调，也使得以老子以及庄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追求一种个性化的人格，并进而追求一种诗意化生存的方式。这些对于中国诗学及其话语诗性特征的塑造和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第六章对《老子》的言说方式和西方的言说方式进行了比较。相比于“道”的不可言说、只可体悟，“逻各斯”是可以言说、可以分析的，从这两个不同源点的基本倾向出发，中国诗学走向了诗性言说，而西方诗学走向了理性言说。从“逻各斯”出发，西方形成了强大的理性传统，从赫拉克利特开始，经由巴门尼德、芝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人们强调理性、注重理性言说的传统是一贯的，并由亚里士多德最终奠定了西方哲学和诗学的理性言说方式，这种理性言说的基本运作

机制是逻辑分析，外在表现为由概念、判断、定义、推理等等，组成了系统清晰的理性话语模式。这与《老子》的诗性言说及其诗性话语模式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根本就是两套话语系统，有着各自鲜明的话语特征。

结论及结语部分总结了《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之间的密切关系，并结合当前“国学热”背景，简要回顾和进一步反思了迄今十余年前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的大讨论，强调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中国古代诗学话语研究以重建中国诗学话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本书围绕着《老子》的“无——道——有”的思想体系，从意义生成方式、言说方式这两个诗学话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入手，系统研究了《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的关系，清理了如“大音”、“大象”、“巧”、“拙”、“虚”、“实”、“玄”、“妙”、“朴”等等大量具有道家特征的中国诗学话语，期望能对构建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当代诗学话语尽上绵薄之力。